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《论语》选评

汤勤福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《论语》选评

汤勤福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论语》选评/汤勤福撰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11.12

(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963 - 3

I. ①论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论语—研究
IV. ①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25141 号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《论语》选评

汤勤福 撰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 × 965 1/16 印张 18 插页 1 字数 183,000

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3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5963 - 3

B · 738 定价: 29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

汤勤福，浙江杭州人，1950年生于上海。师从杨翼骧先生，1995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。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、博导、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。已出版《朱熹史学思想》、《商子答客问》等专著，参编多种专著、译著、教材、工具书。在《中国社会科学（英）》、《中国史研究》、《中国哲学》、《文史》、《南开学报》、《中华文史论丛》、《社会科学战线》、《史学史研究》、《孔子研究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。主编科研软件“e书库文献检索服务系统”。主要研究方向：中国史学史、中国思想史、中国文化史。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编委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水照 王运熙 王兴康 王维堤 史良昭
吕 健 孙 逊 朱怀春 李国章 张晓敏
张善文 赵昌平 袁行霁 钱伯城 徐洪兴
高克勤 郭豫适 曹 旭 曹明纲 葛晓音
傅璇琮

出版说明

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六十年来形成了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。上一世纪，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、并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》与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》两套各八十种，在当时曾影响深远。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。不仅今天五六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，会深情地称之为“温馨的乳汁”；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，也得其熏陶。然而，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，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达、接受习惯，因此本世纪初，我社又为读者奉献了一套“文史哲经典读本”，是为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。

“文史哲经典读本”集结了普及读物出版多方面的经验：名家撰作，深入浅出，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，固然是其基本特点；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，更是她新的关注。吸纳学界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，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达；反俗为雅，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，是其标格所在。

“文史哲经典读本”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，或将作者与作品（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）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，或按现在的知识框架与阅读习惯进行章节分类，也有的循原书结构撷取相应

内容并作诠释，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，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。

“文史哲经典读本”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。其范围涵盖文学经典、历史经典与哲学经典；而在品种上，适应新时代知识浓缩的特点，又简约为文学三十种、历史十种、哲学十种，计五十种。既希望用最省净的篇幅，抉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；又通过三部可分可合的组织形式，以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。

该套丛书问世近十年，已在读者中享有良好的口碑。为了延伸其影响，本社特于其中选取文学十种，历史五种，请相关作者作了修订或增补，重新排版装帧，图文并茂、印制精美，名之为“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”，以飨读者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11年6月

导 言

研究《论语》，实际上是研究孔子，说得准确一些，主要是研究孔子的生平行事和思想观点。

研究者最怕的是有关研究课题的资料太多或太少。资料太多，头绪纷繁复杂，自然投入精力大，分析归纳费时；资料太少，则又常常难以理出一条清晰的理路，难下结论。《论语》研究却又是另外一种情况。《论语》全书15825字，其中孔子弟子的言论1100余字，约占7%，因此，这一最重要的有关孔子生平、思想的直接资料并不算多。然而该书流传2500年来，时代变迁而引起语言上的“隔阂”，仅历代学者对《论语》进行注释的书籍就达3000多种（李启谦《近年来孔子研究述评》，载《孔子儒学与当代社会文集》第11页）。其次，后世学者对孔子思想研究的成果更是汗牛充栋，根本无法准确统计其数量。这些著述观点相左，莫衷一是，也不易理清思路。显然，要消化这些成果也颇费时间。

由此可见，研究孔子是十分困难的事，然而要想真正了解孔子，又只能从《论语》中下功夫，力争正确理解每一段的含义，否则，要想真正理解孔子思想，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。

赵吉惠先生《儒家命运与中国文化》一书中曾讨论“真假孔子”问题，强调真孔子“除了史料真实之外，主要是历史认识上的‘真孔子’，即历史学家主体重构的真孔子，而历史认识论上的‘真孔子’又只有通过史料的中介和对他进行的价值判断，才能成立”，即使是司马迁的史学名著《史记》所载，“最多也只能是‘近似’的真孔子”（第61-62页）。笔者相当赞同赵先生的观点，因为长期以来，确实存在着真假孔子问题，甚至

一些国人并没有区分真假孔子，而是将假孔子捧为神明，顶礼膜拜！

笔者并非要贬低孔子，相反，笔者倒认为孔子确实是个伟人，他不但是他所生活时代的伟人，而且影响极其深远，乃至成为世界名人，实是我国“国宝”级的人物之一。如美国出版的《世界名人大辞典》和英国出版的《人民年鉴手册》都将中国的孔子列于“世界十大思想家”之首，其次才是古希腊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意大利托马斯，波兰哥白尼，英国弗兰西斯·培根、牛顿，法国伏尔泰，德国康德及英国达尔文。可见孔子是货真价实的世界级伟人，无论谁也无法推翻这一结论！

但是，承认孔子是伟人，并不是要神话他，而是像赵吉惠先生提倡的“通过史料的中介”来对他进行价值判断，还原孔子本来面貌。因此，客观而又理性的研究孔子，实是每一位学者应该遵循的原则。

如前所述，研究孔子，最为关键的史料是《论语》本身，因此，从《论语》入手研究孔子，乃是最为准确和简捷的途径。当然，适当采信后世文献资料也是必须和必然的，笔者在本书论述中也采用了这些后世文献资料。但是，采信后世文献资料，一定要与《论语》相印证，既不能盲信盲从，又不可随意“生发”。如果不如此，任意引用，随心曲解，那么，“论证”或“阐释”出来的孔子仍然是“假孔子”。

在这里，笔者还须提出：客观地研究孔子，既需要使用比较可靠的资料，也必须从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出发来研究他，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来阐释他。笔者不能同意为了拔高或贬低孔子，采用现代的一些概念、术语，或引用孔子只字片语来分析或判断。假如有人用现代管理思想来“研究”与“分析”孔子，孔子就成了一位前无古人的“管理思想家”。以《论语》中记载的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、“食噎而餲，鱼馁而肉败，不食。色恶，不食。臭恶，不食。失饪，不食。不时，不食。割不正，不食。不得其酱，不食”（《乡党》等片断，来证实孔子是位“美食家”。诸如此类，确实不利于准确地剖析孔子思想。

或许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，企望光大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便可能在疏释孔子思想时带有某种“自豪感”，甚至将后世学者的一些思想观

点也归在孔子身上，这样的研究必然会走上偏差的途径。国外学者郝大维、安乐哲《孔子哲学思微》一书中曾指出：“强调传统的人往往不喜欢发动激烈的文化变革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否认变革。在中国传统中，人们总是不断地借助于圣人孔子的权威，掩盖了与孔子学说有重大差别的变革学说；借助于促进传统价值连续性的风俗，从而把自己的学说说成是孔子的学说。如《论语》里，孔子一再避免涉及形而上学问题，但深刻的形而上学著作《中庸》仍然以孔子的名义，将自己归属于孔子。《荀子》也打过孔子的旗帜，而事实上，它代表的是远离孔子学说的一种激进理论。西汉著名的儒家学者董仲舒，与其说是孔子或者先秦儒家的代表，还不如说是西汉调和折衷各学说的巨擘，如此等等。”（第15页）郝大维、安乐哲的提醒，是需要我们予以充分注意的。

坦率说，笔者在本书中的研究，只是自己近年来反复对《论语》研究的一些心得，不敢说已经深得其中三昧，不敢自信已离真孔子比以往学者更近，更不敢说已经“恢复”了孔子本来面貌。其实，恢复孔子本来面貌是完全不可能的事，因为距今2500多年前的孔子所留下的最为原始的资料实在太少了！即使《论语》本身，由于时代变迁，各家的解说疏释也不可能都符合孔子原意。因而，笔者根本没有、也不会企望去“一统”诸家，在此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而已。

尽管笔者曾对孔子进行过一些粗浅的研究，也发表过几篇不像样的论文，然而既然要下笔，总还是要重新对原始资料再作一番认真考察，以期在尽可能理解资料含义的前提下，作出合理的解释，以反映自己最新的研究心得体会。大致说来，笔者以为孔子是位超前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家。这一“理想主义”贯穿着他思想的各个方面，然而，孔子的理想主义思想之所以难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实施，是由于他的理想主义思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。换句话说，当时的社会条件不适合这种理想主义的生存，由此导致孔子一生的挫折与坎坷。然而，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具有超前特色，且其中不乏精彩的思想火花，这又为后世社会提供了甚有价值的思想资料，成为历代统治者与许多思想家津津乐道的内容。这

真是塞翁失马之事！

还须指出的是，改革开放之后对孔子与儒家的讨论方兴未艾，尤其对儒家性质判断上，即它究竟是“宗教”还是一种传统学问，孔子究竟是“教主”还是思想家，众说纷纭，难于统一。

在笔者看来，各方争辩的关键是思考的立场问题。

站在“神化”立场来疏释孔子言论中的“微言大义”，将孔子神圣化，必然得出这位前圣是万世常新的“教主”，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对后世有着无穷的启示或意义。因此，孔子成为“神”（教主），后世之人只剩下顶礼膜拜的权力。如此，只能是对儒家的宗教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以“人化”立场来阐释孔子，还原孔子本来面貌，正确疏释孔子言论，分清孔子之语还是后世学者的阐发，那么就会使我们更理性、更清楚地了解真正的孔子，我们就能正确继承乃至发扬他思想中的一些因素。

其实，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，为创立儒家和建立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而奋斗了一生。他确实具有某些“超前意识”，不少见解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学者甚至后世学者，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起着作用。正因为此，孔子思想本身就有被“神化”的条件与可能。历代学者对孔子很少有批评意见，就与此有关。

然而，孔子毕竟是生活在2500余年前的思想家，他的言论只能是当时社会的反映，从总体上说，孔子思想只能在类似的社会条件下起着作用。当然也由于他具有“超前意识”，某些见解也确实会具有对后世的启示意义。因此，孔子思想就可能延续较长时间。然而我们知道，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与演化都与时代条件密切相关，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、社会的发展，任何一种思想不可能千秋万代地完全适应这种变化，于是它们都迟早会被淘汰出局。因而，从理论上说，孔子思想也不可能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，退一万步来说，最多也只能是他思想中某些因素能较长期地流传。

或者有人会说，孔子思想不是传承至今，仍然在起着作用吗？这不说明孔子思想有着“超时代”的效用吗？回答是否定的。首先，传承至今并非孔子思想的全部，更不代表孔子思想的原意。所谓不是孔子思想的全部是明确的，现在谁也不会将《论语》中所有之语作为正确的观点来传播。所谓不是孔子思想的原意，即历代（包括现代）学者的解释早已与孔子思想本身有相当的距离。其实，后世疏释，包括现代流行的各种“阐释”，那只是疏释（阐释）者的意思，与孔子原意是否一致是很难确保的。当然，后世学者可以发展孔子思想，改变其不合适新时代需要的因素，而创立新的观点或见解。但，这也与孔子思想本身无关。例如“内圣外王”，孔子何尝有此说法？这只是后人从孔子思想中生发出来的东西。你说成是新儒家的某一代观点自然没有问题，但说这是真正继承或光大了孔子思想，那就难以被众多学者接受。

这里还须区分孔子思想与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关系。我们并不否认孔子思想中确有比较先进的思想因素，某些思想因素可以在现在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扬光大。在笔者看来，其实孔子思想中某些可以发扬光大的优秀思想因素，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去了。历代思想家包括广大民众，保持、发扬乃至发展了孔子这些优秀思想因素，因而，既可以说是孔子思想原意，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创新。如果仅仅归功于孔子一人，也是有失公平的。

当然，我们也反对把某一思想家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就说成是“宗教”，因为什么是宗教毕竟是有具体规定的，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才能归入宗教范畴，否则只是某一思想流派而已。如果不具体区分开来，那么历代乃至现代许多有较大影响、传承较久的思想都可以归入宗教了，这样，只能混淆思想与宗教的界限。那么，如论你出于回应西方思想文化的挑战也罢，弘扬中华文化或批判落后的陈旧思想也罢，结果都将适得其反。

因此，笔者主张把孔子“还原”为人，而不必把孔子“尊奉”为神，因为这样才能对正确评价孔子思想有积极的意义。把儒家作为一种学问来

研究，那么孔子就不会成为“神”，把儒家作为一种教义来崇扬，那么孔子就必然成为“教主”！

笔者需要再次强调的是，本人的解说难保无错失，只是提出来，以期让人们真正来了解这位有着世界影响的大思想家。

在讨论孔子思想之前，还有必要简单叙述一下孔子的生平状况。

记载孔子生平、思想现存最可信的资料当然是孔子弟子收集并整理的《论语》一书，以及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等距孔子生活年代较近的有关著述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虽较晚出，但此书对资料引用十分谨慎，考证功力很深，因此也较为可信。其他战国诸子如庄子、墨子、孟子、荀子、韩非子等人的著作，后世编著的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易传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等著作，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。实际上，在《尹文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新语》、《新书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盐铁论》、《新序》、《潜夫论》、《白虎通义》、《论衡》、《说苑》等书中，都或多或少地记载着有关孔子的资料，当然在选用这些资料时还需加以甄别。尽管列举了这些著作，但由于作者们的立场不同，所据资料不同，因此其中内容可信程度也是不一样的。

根据《穀梁传》与《公羊传》可知，孔子字仲尼，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阙里（今山东曲阜）人，生于公元前551年十月庚子（公历为9月28日），公元前479年二月去世，享年73岁。他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影响的大思想家之一。

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的社会大变动时期。当时，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，社会生产力有较大的提高，大量荒地开垦出来，私有土地数量激增，促使原有的那种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海之滨，莫非王臣”式土地国有制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了。贵族们对权力、土地与财产的渴望，导致他们之间激烈的冲突，诸侯国之间开疆拓土，掠夺财富，导致日趋频繁的战争。周天子尊严扫地，王室衰微，诸侯争霸，“礼崩乐坏”，一个崭新的社会即将诞生！这就是孔子思想赖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土壤。

孔子祖上是宋国贵族，属于商王室后裔，因战乱而避居鲁国。他的父亲叫叔梁纥，是一位以勇力闻名的武士，曾担任过鄆的大夫。据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，“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”，这里仅说孔子生母姓颜，而北齐刘昼《刘子·命相》“颜徵感黑帝，而生孔子”，是否可信，存疑。孔子大概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，家道中落，因此可以推断他幼年生活是不幸的。

孔子幼年曾从事“鄙事”，他自述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大概在15岁左右开始了比较系统的学习。据现存资料大致可知，孔子曾向老聃求教过礼学、向师苴学习乐、向师襄学过琴，显然，他年轻时期的经历，“学无常师”的学习、受教育的途径，为他积累知识、成为比较博学之人创造了条件。

长大成人后，孔子从事过为人料理丧事的工作，担任过管理仓库的“委吏”和管理牧场的“乘田”。鲁昭公二十五年（前517），30多岁的孔子首先到了齐国，企望在齐国干一番事业。这在《论语》中有所记载。如“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‘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’公曰：‘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’”（《颜渊》）另外，《微子》记载“齐景公待孔子曰：‘若季氏，则吾不能；以季孟之间待之。’曰：‘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’孔子行。”从上述两段资料可见，孔子在齐国提出过“君臣父子”的理论，而齐景公虽然肯定过孔子的这套理论，但齐国贵族对孔子的“君臣父子”的理论并不喜欢，齐景公也不肯任用孔子，孔子只得离开齐国。显然，孔子的“君臣父子”理论并未在齐国得到重视与推行，齐景公自称“吾老矣”显然是托词，因为在孔子离开齐国之后还执政近30年。

孔子创办私学时间很难考证清楚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孔子“年十七，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”，“及釐子卒，懿子与鲁人南官敬叔往学礼焉。是岁，季武子卒，平子代立”，换句话说，至少此时孔子已招有学生授学了。但这还不能算正规创办私学。因为所谓“私学”是打破“学在官府”体制、向平民进行教育的产物，而懿子与南官敬叔都是贵族。现存资料中

未见孔子在齐时招有大量学生的记载，而《史记》中还有孔子“自周反于鲁，弟子稍益进焉”的记载，也就是说，孔子自周王朝返回后才有较多的学生，当起了专职的老师，可以靠收取学生给他的报酬——“束脩”来维持生活。因此，大致可以肯定的是，孔子是在自齐返鲁到赴周返鲁之际，开始创办私学的，而具体在何时则难以确认。

孔子创办私学，这在当时是件破天荒的大事。我们知道，当时所谓“学在官府”，是指贵族才有学习文化知识的特权，因此文化知识的传播仅限于贵族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。而孔子打破了这一限制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，这不能不说是一项极其重大的创新。因此，后世统治者称誉他为“万世师表”，在整个封建时代中被称之“圣人”，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。在教育史上，人们将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教育家，也是名符其实的。

孔子创办私学，收徒教学，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，《史记》卷四十七《孔子世家》、卷六十七《仲尼弟子列传》所记孔子弟子甚多，可参见。所称孔子有“弟子三千，贤者七十二”，但“三千”不是实指，仅是指多而已；而“七十二”也难指实，因为根据《论语》与《史记》所载，这“七十二”很难落实，即使现在所了解的孔子弟子，能说成“贤者”恐怕也没有这么多。据有关资料记载，孔子学生有颜渊（颜回）、有子（有若）、曾皙（曾点）、曾子（曾参）、子路（仲由）、子贡（端木赐）、闵子（闵子骞）、子夏（卜商）、子张（颛孙师）、子贱（宓不齐）、子羔（高柴）、子游（言偃）、子华（公西赤）、公伯寮、公冶长、樊迟（樊须）、冉子（冉有）、冉伯牛、司马牛、南官适（南容）、孔鲤、原思（宪）、漆彫开等人。至于向孔子求教过各种知识者，上到诸侯、大夫，下到平民。

由于收徒教学，且与诸侯、大夫交往，孔子学术声望越来越高。鲁定公九年（前501），51岁的孔子终于被任命为鲁国的中都（今山东汶山县境内）的最高的行政长官中都宰。不久，孔子又升为司空，主管鲁国的建筑等事务。定公十年，孔子担任司寇，即主管司法刑狱的长官。从中都宰到司寇，孔子在鲁国前后任职约四年。定公十三年，由于孔子所宣扬的

理论与鲁国政治局势并不吻合，于是孔子弃官出走，带走一批学生周游列国。此后14年中，孔子先后到过卫、陈、曹、宋、郑、蔡等国，游说诸侯与诸国执政者，宣扬自己的政治思想与主张，然而并没有一个国家对此感兴趣，因此孔子到处碰壁，颠沛流离而郁郁不得志。

鲁哀公七年（前488），南方强国吴的势力已经对鲁国构成威胁，并出兵攻打鲁国。虽然鲁国击退了吴国，但鲁国早已不是当年的强国了，国力江河日下，执政的季康子深深感到国危情急，迫切需要大量人才来保卫国家，于是把孔子的弟子冉有召回。不久，齐国入侵鲁国，冉有率军打了胜仗，击败齐国。于是，冉有乘机向季康子推荐了自己的老师孔子。不久，季康子派遣使者，带着礼品，赴卫国礼迎孔子。于是，孔子返回了故国，结束了在外漂泊不定寄人篱下的生活。

实际上，孔子返回鲁国并未得到重用，虽然鲁国的执政也向他咨询过一些政事，但并不重视他的见解。孔子也只得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，于是他转而致力于教育活动，并集中精力，先后整理了古代文献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，还将鲁国史书《春秋》进行删改，编成《春秋》一书。这就是孔子修“六经”。孔子修订的古代文献，除《乐》之外，其他都保存下来了，他为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。可以说，孔子是我国最早的最伟大的文献学家。

如上所述，孔子返回鲁国并未春风得意，就连他唯一的儿子孔鲤也先于他而去。孔子年老丧子，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。其实这仅是一连串打击的开始。鲁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夏，孔子最倚重的弟子颜渊去世。孔子顿足痛哭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次年，卫国发生政变，曾长期跟随孔子的弟子子路被人杀死。这一连串的打击对孔子来说无疑是极其沉重的。鲁哀公十六年（前479）夏历二月十一日，孔子与世长辞，走完了这令人感叹不尽的一生。

就当时来说，孔子确实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。现在保存下来的由他弟子收集整理的《论语》，内容极其丰富，涉及孔子的社会政治主张、哲学观念、教育学说、伦理思想、道德修养，以及为人处世之道等等

方面。

笔者通过对《论语》的解读，感悟到孔子是位理想主义的思想家，他一生的言行都表现出他对“理想”的追求。从《论语》与其他现存有关的资料来分析，孔子主观愿望是想建立一个自己所希望的理想社会，这一理想社会中的制度、伦理、人格、人际关系、教育等等，都应该是完美的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孔子是“理想”主义者，而不是幻想家，也不是空想主义者。因为幻想只是虚玄神游，而空想则是毫无现实基础。孔子的理想主义仍有一定的现实基础。换句话说，他的理想主义思想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，然而又是超越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。因此，孔子所追求的“理想”社会并没有在他那个时代中出现，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他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所导致的。当然，社会现实没有让孔子实现其理想，并不能等同其理想毫无价值。恰恰相反，在笔者看来，孔子的理想不但有价值，而且有相当的价值。因为这一理想从总体上说，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势，因此，他的思想才会被他后学所继承并发展，对其他学派的学者也有一定影响，而且在之后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发挥着其他思想所无法替代的作用。否则就不能解释孔子的思想为什么被后人所接受，而且发挥相当大的作用。值得补充的是，过去有学者认为孔子是个倒退的、保守的、落后的思想家，其实这个观点不能成立，因为把孔子说成是倒退、保守、落后的思想家，那么就不能解释为何他的思想会被后人接受与发挥了。可见，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，不能成立。当然，笔者并不否认孔子思想中确实也存在一些比较落后的观点或因素，但比较而言，他思想中的积极成份远远超过其落后部分。

我真正接触孔子思想，是改革开放之后。我是77级大学生，虽说那时已经开始扭转极左思潮的影响，但毕竟老师们上课仍心存顾忌，讲《论语》时对孔子评价总不是那么清晰。走上工作岗位，由于我对思想史比较感兴趣，自然须浏览有关思想史的著述，在阅读过程中，发现时贤对孔子研究中尚有一些疑问无法解答。因此苦思冥想，逐渐形成一些